



《讲台上下》是上海福山外国语小学教师朱煜的教育随笔集,全书收录了60篇文章,一篇一个故事,一篇一个主题,像穿在一条线上的珍珠,每一篇都精彩动人。

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讲教育与读书的关系,题目是《教书与读书》,在这篇随笔中,朱煜先介绍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带给阅读者的影响,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,不同年龄的人读来会有不同的感受,那种亲情的美好涵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学生。朱煜的特别之处在于,他从父子间的亲情联想到教师与学生的相处之道,想到教师爱学生的理由:学生身上具备很多已经被成人选择性忽视的美好人性。这种美好人性大多是隐性的,需要老师去发现、去激发、去呵护,让美好的品质在学生身上尽量保存得更久些。

我也是一名老师,在孩子中间,总能让我感受到无尽童真的美好、童趣的快乐。孩子的世界是那么单纯,因为爱这些单纯的孩子,我的内心也受到净化,日子也变得空灵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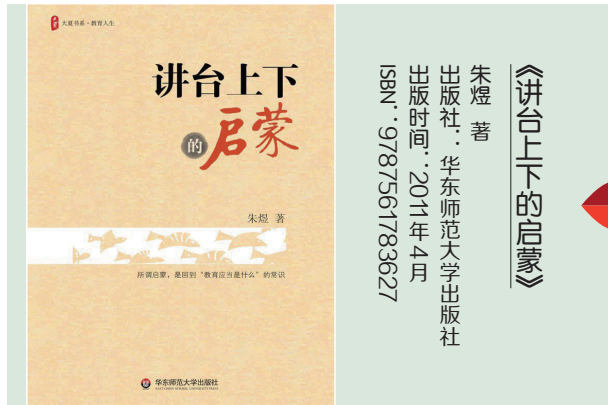
朱煜对孩子的爱与教育,源于书的引领。他认为,是苏霍姆林斯基教会他如何当老师,因为他系统地阅读了《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体系》《苏霍姆林斯基的一生》,以及苏霍姆林斯基的其他作品,这些书籍的阅读让他加快了教育专业成长,为他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
关于如何上好语文课,朱煜的观念也让人耳目一新。“要干净,不要拉拉杂杂。一堂课,定下一两个目标,认真真地设计、落实,让学生专注地听、专注地想,扎扎实实地练习表达,走出教室的时候能真正学到东西。”这种观点同样来源于阅读,来源于他读屠格涅夫后的感受,像董桥的评价:“干净是好的;人和文都一样,要干净,像屠格涅夫,像初恋。”

朱煜不但读教育理论著作,读古今中外的美文,也和孩子一起阅读童书。譬如我最喜欢的文章标题是《世界还小,我怎么能老》,就来自童书《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》。爱孩子,就要和孩子一起成长,也应该跟孩子一起读儿童文学作品,与孩子建立起互通的话语系统。教师为什么要读书?朱煜说,教师读书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学识渊博,懂得尊重孩子,能够依据孩子的学习心理和成长规律选择多样的教学方式,能够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的真正启蒙者吗?

常听到有老师慨叹:现在的孩子,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四通八达,越来越不好教了。扪心自问,是不是我们这些教书的读书太少了?读书,是我们当老师的提高专业能力、促进专业成长的必由之路。

和孩子在一起,我们的世界可以一直像小时候那样纯真。世界还“小”,我怎么能老?我要向朱煜学习,跟孩子们一起学习、一起读书、一起成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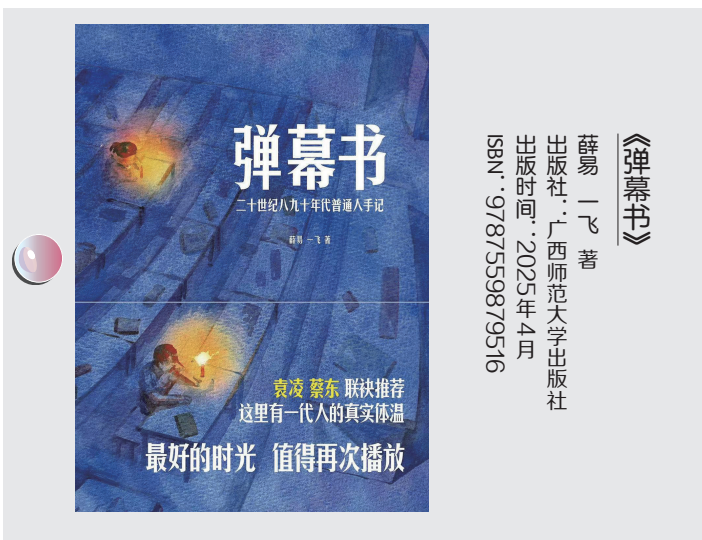
《弹幕书》

薛易 一飞 著

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25年4月

ISBN: 9787559879516



翻开青岛作家薛易和一飞合作的《弹幕书》,仿佛打开了一个装满旧时光的盒子。这本书的独特之处,不仅在于它记录了1984年至2003年一个普通人的成长历程,更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——50位来自不同年代、不同背景的读者,以手写批注的形式,在书页边缘留下了自己的声音。这些彩色跳跃的“弹幕”,让个人的记忆变成集体的共鸣,让私密的回顾成为开放的对话。

在《1989:麦垛上的月亮》一文中,作者对麦收时节的描写尤为动人。作者回忆童年时帮着家里割麦子的经历,那种劳累的感受跃然纸上:“麦垄几百米长,弯腰久了,抬头一看,两眼发晕。”这不是田园诗般的怀旧,而是带着汗水与疼痛的真实。更珍贵的是,在这段叙述旁,有读者批注道:“我就是在割麦子的时候下定决心一定要‘考出去’。”这些批注不是冷冰冰的评论,而是带着体温的回应。这些“弹幕”,有的笔迹工整,有的潦草,有的用蓝色墨水,有的用黑色墨水,仿佛能看见不同的人在不同时空伏案书写的姿态。

书中对时代普遍记忆的记录尤为珍贵。在城市化进程深入推进的今天,许多年轻人已经不了解当年的农村是什么样子。麦假、秋假、年假的区分,轧场、扬场的农事细节,这些即将消失的记忆被作者细致地保存下来。这不是猎奇,而是对来路的诚实记录。书中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:关于粮票的记忆、关于第一次看到高楼的新奇、关于在工厂打工的青春。作者写道,记忆有时是“苦忆”,但正是这些带着苦涩的回忆,构成了我们理解过去的基石。他们没有美化童年,也没有刻意渲染苦难,只是平静地讲述,如同在月光下细数麦垛上的麦粒,一颗一颗,都是生活的原貌、纸上的对话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“彩蛋”部分的10个故事:李珍回忆老师背发烧的她回家,并劝说父亲让她继续读书;白胜伟讲述开食杂店养家的艰辛,在铁路道口险些遇险的经历;袁振从童年看“大高楼”到长大后走遍世界,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惊奇……这些普通人的真实故事,与作者的叙述相互映照,形成了一幅丰富而生动的时代画卷。

《弹幕书》记录的20年,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20年。宏大的历史进程在书中化为了具体细微的个人经历。作者没有直接评述时代,而是通过一个个生活片段折射出时代的侧影:价格双轨制下的农村境况、“非典”时期的特殊氛围、千禧年之交的期待与忐忑……

《弹幕书》没有刻意去迎合当下浮躁的阅读习惯,反而邀请读者慢下来,在书页的留白处写下自己的感受。这种互动不是即时的、表面的,而是深度的、沉思的。正如一位读者在批注中所说:“这份稿让‘80后’的我爱不释手,与其说它是一个人的回忆,不如说是一代人的经历。”本书通过创新的形式,让记忆不再是私藏的相册,而成为可以共享、可以对话的公共空间。它更像是一次温暖的尝试——在日益虚拟化的时代,重新找回纸墨的温情;在众声喧哗中,打捞那些即将沉没的个人故事。

打捞一代人的温情记忆

彭忠富

茶馆、小酒吧、苍蝇馆子……成都人爱热闹,总是凑在一起,他们在无形之中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公共空间。历史学家王笛敏锐地捕捉到了“茶馆”这个具有成都特色的文化符号,探讨“茶馆”这一公共空间如何反映国家与社会的互动,以及公共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存续与转型。

继《茶馆: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(1900—1950)》之后,王笛拓展了他考察成都茶馆的时间线,近期出版了新作《茶馆: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(1950—2000)》,将“茶馆”在长至百年的历史进程里的意义讲述得更加丰富、复杂,更突出了时代对茶馆文化的影响以及“茶馆”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城市生活的塑造。

以时间为序,王笛对成都的地方文化做了细致地发掘: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何种地位?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的互动有何意义?社会运动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?大众文化与地方治理怎样交互影响?……

茶馆,作为成都的常见场所,成为王笛观察社会的窗口。王笛采用微观史路径,不只注意其内部运作、茶馆与客人的关系,还侧重探讨信息交流、经济交易、社会纠纷、行话规则、文化表演、市政谋划等活动如何在茶馆这个“小世界”里有条不紊地进行,以及国家对茶馆的改造及其结果。

成都茶馆的特质,可与西方的咖啡馆、啤酒馆进行对比,但与之不同的是,茶馆更突出一种特定地域内的认同,更具“草根”气息。茶馆的顾客更在乎的是特定范围内的地方政策对他们的影响,而不那么在乎整体性的国家大事——从历史经验来看,川蜀地区天然地较少受外部环境的影响。

正如王笛所指出的,成都的茶馆曾经具备着多种社会功能,除却肉眼可见的餐馆、理发、评书、戏剧等活动方式,茶馆本身是建立社会网络的重要地点,人们在此依靠“公议”判断是非,在茶碗之间展开谈判,通过一包烟、一碗茶心照不宣地进行着利益的交换。茶馆内部构成了一个独立于外部社会的小社会。这种小社会表现在外部环境上,便是一种保守性,一种对社会意识的不服从;小社会内部有其自己的规矩,他们不服从于外部的规则与干涉。茶馆内的小社会以地域为纽带,地域的纽带下只有其核心部分是牢固的,其外层的架构具有相当的流动性。如以“打围鼓”为首的各种民间艺术活动及茶馆内部的评书、戏剧等,往往只是借茶馆的名义,据一片屋檐开展自身的活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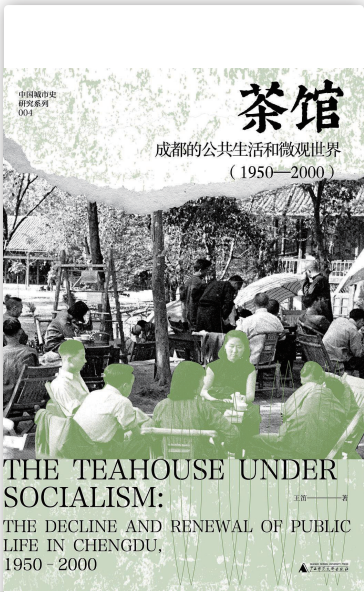
“计划经济”时期,茶馆因不符合工业发展需要及其他时代因素而衰落,但民间社会的韧性依然顽强生存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,茶馆分化成街角茶铺(保留传统)和新式茶楼(迎合中产群体),功能转向休闲消费与商业洽谈,娱乐活动的多样化呈现了国家治理策略的多样化。在新兴的消费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,无须强力驱使,茶馆自觉地完成了它的转型——转向服务性。为市民服务,成为茶馆的宗旨。

王笛以两部《茶馆》树立了中国历史学的微观史范式,系统论证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多元性,构建了成都茶馆从“民间自治空间”到“国家治理对象”再到“市民娱乐场所”的百年变迁史。《茶馆》是一个很好的切口,“公共领域”如何作用于“市民社会”概念的内涵和外延,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重要课题。

立冬已至,成都的太阳再次变得珍贵,等一个可以晒太阳的晴天,“泡”茶馆,读《茶馆》,一定别有滋味。

成都茶馆：公共空间下的小社会

赵昱华



《茶馆》

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(1950—2000)

王笛 著

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出品方:大学问

出版时间:2025年8月

ISBN: 9787559882158

和学生『斗智斗勇』

成都华西中学 张立萍

坐在办公桌前,我悠闲地翻看着一本本厚厚的毕业相册,一张两个男生互相揪扯的照片“跳”入眼帘,瞬间把我的思绪带回3年前的一天。

那天,我刚扫平一重重“作业山峰”,好不容易坐下来平静一下,突然,班长急匆匆地来到办公室,慌张地说:“张老师,小H和小W又在教室里扭打起来了!”

听到这话,我的脑袋嗡嗡响,心想,初一新生入学才多久,这群孩子怎么就开始打架了!“军情”紧急,没等班长把话说完,我就百米冲刺来到教室。好家伙!这场“战斗”正如火如荼地进行,场面相当“精彩”:两个男孩你掐着我的手臂,我抓住你的衣领,面红耳赤……

好在久经“风雨”,我尚能游刃有余地对付:“哟,才认识几天,你们就要开始比武大赛了,来!来!来!其他同学把所有桌子、板凳、书包那些全部挪开,给他们俩留出场地。张老师今天来给你们当裁判,规则如下:碰到对方头部位位置算犯规……”

我语气平和但眼神凌厉,不到1分钟,两个孩子终于把抓住对方的手慢慢松开了,狠狠地看了彼此一眼,从地板上站了起来,异口同声地说:“老师,我们不比了。”

“战斗”停止就好,我宣布:“比赛结束,请两位选手到我身边,请其他同学回座位。”

到了办公室,小H和小W还是气鼓鼓的。我没有急着说教,而是紧紧盯着他们。大约3分钟后,两人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。我开始询问:“你们谁可以给我说说,为什么打架?”刚才的平静完全是一种假象,我话音刚落,办公室就炸开了锅:“他走路撞我,不给我说‘对不起’。”“每次走到他面前,他都用眼瞪我。”“他不止一次把我的书扔地上了!”……两个男孩你来我往、叽叽喳喳控诉起来,我一时分不清是谁在诉苦,但在这激烈的言语里,我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缘由,对此事的处理,心里也有了方向。

我知道小W同学特别疼爱妹妹,于是问:“小W,如果今天是妹妹踩到你,也没给你说‘对不起’,你会打妹妹吗?”小W犹豫了一会,说“不会”。“为什么呢?”我接着问。“因为妹妹还小,妹妹又不是故意的。”顺着小W的话,经过我几个来回的点拨,小W知道了“小H并非故意为之”。之后,我再“敲打”小H:踩到别人,不说“对不起”,确实不应该……两个男孩其实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,经过我反复细致地思想引导,他们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为了杜绝后患,我结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特别爱面子的特点,“威胁”他们:如果下次还要打架,我一定会通知家长及全班同学一起观看。看到他俩真诚地互相道歉,我真的又好气又好笑,瞬间,我灵机一动,决定给他们安排一个新职务。

“从今天起,你们就是班级的‘小警察’,班级如果出现此类事件,你们必须制止班级里的冲突,及时告知老师,并协助老师解决同学冲突事件。”没有批评,没有指责,犯了错还能“当官”,面对老师布置的任务,小W和小H有点手足无措,但欣然接受了。还别说,我这个机智的“小点子”真的发挥了作用。从此以后,曾经的“打架王”变成了思维清晰、处事冷静“的小警察”。我及时的褒奖与肯定让他们越来越能干,同学间的冲突越来越少,班级氛围也变得更加和谐融洽。

自然纪录片里,小狮子之间经常打斗,你抓我咬是常态,初一年级的男生有时就像可爱的小狮子,他们自控力有限。一旦同学间发生矛盾,很容易发展为肢体冲突,但我们只要留足缓冲时间让他们反思,他们的情绪来得快、去得也快。而且,青春期的孩子要面子,给“台阶”比给“处罚”更有效,公平对待比判断“谁对谁错”更有价值。老师只要看准了冲突双方的需求——是求关注、缺认同,还是消除误解,就能对症下药。

随着时间推移,小H、小W成了我的“小跟班”,他们不再沉迷于切磋武艺这种简单游戏,而是与我在数学题解法上较劲。小H数学思维敏捷,认为解题步骤是负担;小W数学基础知识扎实,解题总想找技巧。

第一次直接的纷争,发生在初三的

几何复习课上。一天课上,我用“辅助线构造全等三角形”的普通解法讲解一道题,话音未落,小W突然举手:“老师,我用相似三角形也能解,为什么一定要用全等三角形解法?”他快速冲上讲台,在黑板上画出不同的辅助线,并快速列出线段比例式。解法没错,但步骤比普通解法多近10步。“你的方法可行,但我的解法更有效率更重要。”我下意识强调普通解法的普适性。小W直接表达了抗争:“为什么一定要按‘标准’来?”

接下来两周,冲突慢慢升级,小W与小H这对“欢喜冤家”居然结盟与我对抗。他们故意在作业中只用自己的“非常规解法”,哪怕步骤繁琐,也不愿启用普通解法。单元测试时,小W用相似三角形解压轴题,因计算失误丢了8分,小H丢了6分。

“你们看,不是方法不对,是你熟练度不够。”我指着试卷说。两个孩子梗着脖子反驳:“但我们的思路是对的!”办公室里,阳光透过玻璃,在他们倔强的侧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。我突然意识到:这两孩子抗拒的不是普通解法,而是被全盘否定的感受。

一天中午,我邀约俩孩子进行“解题比赛”——他们用相似解法,我用全等解法,限时10分钟解同一道题。倒计时结束,我们同时停笔:我的解法写了足足半页纸,而小W的步骤精简到仅有5行。

第二天课上,我请小W把他的解法作

为“拓展思路”分享给全班,并肯定性地评价:“普通解法是‘基本技能’,小W的方法提醒我们:题目里藏着‘捷径’,需要更敏锐地观察。”我的表扬让两个孩子非常得意。紧接着,我在黑板上并排写下两种解法,用红笔圈出关键差异点,转向小H、小W,提醒:“但前提是,你得先掌握‘万能钥匙’,才能放心找‘捷径’。”瞬间,我们3人有了眼神交汇,两个孩子快速翻开了笔记本,用普通解法把那道题重新演算了一遍。

毕业后,两个孩子顺利升入本校高中,偶尔遇见他们,我们还会调侃起普通解法与巧法,他们自豪地说:“现在学数学,我既会用老师教的‘标准动作’,也敢自己‘创新招式’。”望着他们走向高中部的背影,我再次深刻认识到:教育者的任务不是灌输“唯一解”,而是教会学生根据实际选择“最优解”。真正的认同始于被看见。当小H、小W发现自己的思路被尊重、被纳入“解法体系”时,他们才愿意接纳普通解法。如今,给初一学生讲课时,我总会多问一句:“还有其他思路吗?”

“当你在初中教室上课时,他们会偷偷在外面听,感觉情况不妙时,便一哄而散。回到高中班级,还会一本正经地模仿你好久几天……”听着家长们的反馈,我思绪万千,虽然和孩子们“斗智斗勇”颇费脑筋,但能获得学生的认可,这或许就是当一名人民教师的幸福吧。